

近日,有报道称《道德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及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将正式进入高中课堂。尽管这是一则假新闻,却依旧引发社会热议,褒贬不一。

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,当我们缺乏国学教育的时候,大家纷纷表示要学习台湾。而国学教育真的来了,大家又争呼“这样不行!”这种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,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迷茫。

本报记者 魏新丽 陈玮

一条假新闻引发的社会焦虑

“首套国学教材9月进课堂,《道德经》将全本讲解!”

最近,这样一条新闻成为热门话题,引发围观群众的热议讨论。有质疑的:“老是学些过时的东西,以后工作能用到?”有反感的:“最讨厌这些东西,难怪中国人没有创造力。”有担心的:“现在的语文老师能讲得懂了吗?”也有称赞的:“华夏经典相承习,人神道德流传芳。”

不过,根据媒体随后的调查证实,这其实是一条假新闻。制定该“教材”的“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”并不是教育部下属机构,没有制定教材的权力,这套所谓“教材”只能算是课外读物。

但不管怎样,对国学话题,公众始终保有高度敏感性,一有点风吹草动就恨不得撸袖子去干架。

当缺乏国学教育时,人们为传统文化的远去而焦虑,大谈文化的缺失、价值观的混乱,指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回归来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。为此,人们还寻找到一个很好的参照系——台湾。在媒体报道中,台湾因为一直坚持国学教育,那里的民众谦和文雅,社会价值观趋向统一。

于是,台湾的国学教育被奉为榜样。2008年,台湾国学教材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》首度引进大陆,改编为《国学基本教材》,由新华出版社出版。2013年,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》再度引入,由中华书局出版,并正式走进高中课堂。北京四中等30多所学校将其设为选修课教材。

但是,这本教材的遭遇并不乐观,大多数学生不买账,有的选修课选课人数仅为个位数。反对者认为,这样的课堂挤占了学生的高考冲刺时间,语文老师也不具备教国学的能力。

直到现在,一提到要将国学教材引入课堂,未及核实新闻真假,各方肯定还会争论起来。人们还是焦虑,甚至于恐慌,担心国学教材带来封建糟粕的复辟,带来民主科学的消退。

这是一种叶公好龙的心态,国学就是那条龙,仅仅看上去很美。

学的是文化,教的是价值观

要探究这种欲迎还拒的心理,首先我们得搞懂,国学教育的实质是什么。

其实,近些年来,中国大陆的语文教育比重是逐渐加重的,其中,古诗文也一直占据重要地位。不过,在《国学基本教材》主编叶匡政看来,大陆的语文教学体系以学习知识为主,更像一种工具,而这正是问题所在。“大陆关于传统文化的教育,分散到历史、文学、哲学三个学科中,是隔开的体系。”叶匡政说,“现在最缺人文和哲学方面的教育,导致没有统一的价值观,大家在一些常识问题上甚至都不能统一。”

在他看来,引入国学教材,就是要弥补这个缺陷,也就是说,要通过国学来传递一种价值观。

从教育入手,是因为这符合中国传统。“西方社会价值观通过宗教完成,比如在社区和教堂,而中国是通过教育完成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培养,比如通过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经典等。”叶匡政说。

以传递价值观为主要目的的国学教育,在台湾很典型。台湾高中生同时学习



台湾国学教材曾引入北京四中等中学作为选修课供学生学习,但效果并不理想。(资料片)

《道德经》进课堂引发争议

国学就是叶公的“龙”

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》和《高中国文》。前者主要是价值观的教育,以“立德树人”为宗旨,比如《大学》教人由内在的德性修养到外发的事业完成,《中庸》作为儒家人生哲学,个人修行的宝典。

在2013年引入大陆的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》中,同样将道德培养放在首位。其中的今人今事部分,就引用了感动中国的人物事例。

对于这次《道德经》要进入课堂,赞同者也认为,这有利于修身养性。有家长表示学习《道德经》,可以让孩子懂得感恩。

“现在内在矛盾显露,自身难以解决问题,需要从传统中寻找答案。台湾现代化发展比我们早,遇到的问题也比我们早,所以他们比我们更早觉得,要回到传统寻找启蒙的价值。”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说。

功利主义者的抵制

以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的国学教材,旨在传递价值观,树立道德标准,学习为人处世方式等。然而,在功利主义者眼中,一方面,在高考为重的应试教育体制中,价值观的东西是无用的——如果不进入高考,会浪费时间;如果进入高考,又有变成八股文的嫌疑。另一方面,学这些东西,不如学点法律、医学知识更有用。

当然,对于国学,民众是有多方面需求的。民间的读经班、国学班火热就说明这一点。叶匡政说,民众对信仰缺失存在恐慌,他们在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建立信仰。

但是,现代中国与传统文化有严重的割裂,很多人对传统文化很陌生,从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开始,到“文革”时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,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主,对于传统价值观,我们普遍缺乏亲近感和认同感。

“在特殊的历史时期,我们将传统文化放到文化认同之外,三十年不允许触碰,用别的观念去讲解传统文化,整成了‘四不像’。三十多年以后再补课,自然是晚了。”叶匡政说。

何中华认为,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抵触几乎成了一种本能的排斥。“我们现在是用西方近代思想观点来启蒙的。看待传统文化,就是儒释道,所以直到现代,对它们都是一种本能的排斥。这是一种现代化的自负。”

叶匡政表示,国学教材进课堂的反对者以知识分子居多。“大家希望社会更为开放更为民主,担心推广传统文化会恢复封建糟粕,造成思想上的禁锢。”

国学应该是“泡出来”的

“在推行国学的政策中,国家应该循序渐进、自上而下地推行,比如先走进高中课堂,先作为课外读物。”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李振聚建议。

叶匡政认为,我们应该选取国学里的精华部分,同时与时代结合。“哪个时代编写哪样的教材,应该特别注重对现代社会的容纳性,保留传统思想,同时对现代社会的事情进行解释,不能变成考据型的。”

还有专家提醒,现在社会上的国学很热,但不排除虚热的成分。比如某些读经班强调死记硬背,国学甚至跟风水、八卦搭上关系,无疑会让一些理性人士感到难以信任。

还有人担心国学教育会成为应试教育的牺牲品。而对国学和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养成,不是上几堂课就可以的。何中华认为传统文化是“泡出来”的,要有一个氛围,潜移默化地培养一种特别的认同。“一个人格最可塑的年龄段是0至6岁,超过这个年龄段灌输,就会对传统文化本能地排斥,因为有机体越成熟越容易排斥。”他说。

台湾学者阎鸿中也曾说过:“台湾家庭教育重视社会传统,家长会让孩子背很多经典。台湾民间也有大量学者在讲传统、讲经,很多大学老师自发到民间去讲这些东西,这些都不是政府推动的。”

“我认可传统文化,因为我认同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精华部分是统一的。”叶匡政说。



德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《铁皮鼓》作者君特·格拉斯 (资料片)

君特·格拉斯： 把德国的伤疤揭给人看

本报记者 张榕博

那位将《铁皮鼓》带给无数中国文青的君特·格拉斯走了。没有君特,世界文学界无疑遭受巨大损失,但请不要为此而悲伤,因为君特已向世界清楚阐释了一个时代里日耳曼民族的内心世界,这就足够了。

《铁皮鼓》是一部回溯德国人对战争的作品,但君特·格拉斯没有美化战争,也没有将全部罪行推向“元首”。君特说:“人们曾经装作似乎是某个幽灵误导了可怜的德国民众,而我从年轻时的观察得知,并非如此。一切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。”

这部最早提出德国民族对纳粹罪责问题的作品,一经问世便引发欧美强烈反响。它被誉为当代德语文学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,君特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

君特一生反对战争,因为他看到了人性当中的原罪。1961年与1963年,他先后完成了《猫与鼠》、《狗的岁月》,因为故事都发生在君特的故乡波兰但泽地区,因此这两本小说与《铁皮鼓》合称“但泽三部曲”。

君特认为,撰写这样的作品,“并不是我选择的,而

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,就像一件随身携带的行李,从我开始写作,它就伴随着我,迄今仍未了结。对我来说,就是尽力用文学作为工具,去进行教育。”

君特同样反对政治与文学走得太近,但战争后遗症一次又一次把他拉回到政治与文学中去,并促使他将文学推向政治。有评论认为,今天德国对二战罪行的深刻反省,很大程度上与君特这样的文学家有关。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,“阐释战争中人们灵魂的痛苦、现在和将来,始终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。”

晚年时,君特·格拉斯在作品《剥洋葱》中披露了自己曾经作为一名党卫军的过去,这位“道德老人”因此被许多人批评是一个“伪君子”。但君特不这样认为,他甚至喜欢这种从“零点”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因为在二战结束近半个世纪以后,对于战争的讨论已经走向理解与反思。此时,他的这篇自述式小说悄然为日耳曼民族曾经的过错做了一番解释。

今天,我们很难启齿说,我们是看着君特的小说成长的,因为很多人对他并不熟悉。但作为一名作家,君特·格拉斯对国家和民族的世界性贡献,值得每一个人去理解和尊敬。